

遵义海龙囤与播州杨姓源流



海龙囤景区

海龙囤位于遵义市北30公里的遵义县高坪区太平乡白沙村。海龙囤众山簇拥，峡谷幽深，龙岩山高耸入云，峡谷中有白沙水，方圆约5公里，四周有铜柱关、铁柱关、飞龙关、飞风关、朝天关、飞虎关、万安关、西关、云凤楼，以及水牢、金库、银库、火药池、绣花楼、校场坝、采石场等遗址。海龙囤孤峰入云，四面陡峭，山后一线窄径是唯一通道，山下湘水环

流，群峰簇拥，壁垒森严，完全是一派军事要塞的形式。

海龙囤是播州土司杨应龙的祖先利用地形修建的土司城堡，是贵州境内目前仅见的一处大型军事建筑与宫殿建筑合二为一的遗址，也是当今中国乃至亚洲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城堡遗址。

海龙屯又称龙岩囤，系龙岩山主峰，海拔1500米，孤峰挺立，左邻娄山关，右靠金鼎山，群山簇拥，四面陡峭，唯山后仄径一线可攀行。此囤为土司杨氏统治播州的最后一个据点。唐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杨氏始祖杨端击败入据南诏，从此世领播州。唐宋朝廷鞭长莫及，元朝正式推行土司制度设播州宣慰使，杨氏子孙世袭。传至29代孙杨应龙，在海龙囤“设险以守其国”。方圆5公里的囤上，建有土城、月城三重，演兵场、养马场等分布其间，楼台亭阁，鳞次栉比。囤前设铜柱、铁柱等9关，重兵把守，沿囤边缘筑有城墙，俨然要塞。明万二十七年(公

元1599年)，杨应龙举兵入川，反叛朝廷。明廷震惊，随即调集8省共24万兵力分道进剿，历时114天，于次年6月攻破海龙囤，杨应龙与其妾自焚身亡，史称“平播之役”。统治播州724年的杨氏家族覆灭，播州土司制度也随之结束。如今，海龙囤上遗迹众多，有的完好无损，有的依稀可辨，几百年来，直为好古者凭吊。

唐朝时，以当今遵义为中心的“播州”广大地区被“南诏国”彝人占领，公元876年，朝廷派杨端前来平乱。事平后命杨端“世袭”播州，建立了持续七百余年、共29代的杨氏土司政权。政权初建，为“设险以守其国”、并作“保固之根本”，于州治西北15公里之“龙岩山”建“龙岩囤”，平时练兵，战时作行政、军事中心。南宋末年，为防“元兵”来犯，扩建加固，增修“养马城”“养鸡城”等形成体系，又与附近的“娄山关”、“鼎山城”形成纵深防御系统。明朝时又重修。

明朝末年，杨氏29代“土司”、骠骑将军、播州宣慰使杨应

龙与川、渝地方发生矛盾，后激化为军事冲突、演化为叛乱。1600年，国力衰竭的明朝廷最后倾全力调8省之24万军队分8路发动“平播之役”。战争初期，北面川军3000人在娄山关全部被歼、片甲不留，南面的乌江之战，消灭联军3万人马。相持两月，播州各地关隘相继失守，杨应龙只好带领1.7万人马退守海龙囤，各路官军围而攻之。由于守军有天险可凭，有积储足恃，有悍勇苗兵可用，囤下河谷中官兵死伤颇众。几经努力，苦战114天，官军终于爬上“后关”，攻占了这座“坚不可摧”的军事要塞，“斩级22687颗”，“招降播民一十二万”。“龙岩囤”被焚毁，后又被易名曰“海龙囤”。意为“龙困于海，不能再兴云复雨”。播州从此“改土归流”、分为两府，一曰平越府，划与新建的贵州省；一曰遵义府，隶属四川省。

海龙囤群山环峙、孤峰挺立，形如细颈葫芦，北、东、南三面临湘江河之主源“白沙水”，全是绝壁；后为一蒂，仅羊肠小道通到“白云台”、“金鼎山”一带的深山大箐。当初杨氏于囤东侧山下设三关：铁柱关、铜柱关、飞虎关，及“天梯”形成前沿防御体系；囤上再设三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囤后又设三关：万安关、西关、后关。关墙重重叠叠，先后建有月城、土城，囤上有三道城墙环绕，其沿山蜿蜒的雄姿，酷似万里长城。

经过千余年的沧桑，现在海龙囤不再固若金汤，早已不见“养马城中，百万雄师旌日月；海龙囤上，半朝天子镇乾坤”的宏伟气象。几户农民已将其变成大片杜仲林场。当年官兵焚毁的主要是木结构建筑，而城墙、关隘敌楼、卡门和石砌建筑仍然保留着400年前的形制，展示着惨烈战争后的场景：外围气势森严的巨石门洞、箭楼上巨大的石制柱础、36步天梯俱在；囤内老王宫、新王宫、总管厅、金库、军营、校场、火药库、绣花楼等遗址尚存。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古城堡”。

海龙囤遗址对于研究中世纪的军事、政治、技术、工艺等，颇具价值。四百年来，文人学士、官绅百姓游览凭吊者，络绎不绝。特别是“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简直就是一部反映当时军事要塞管理制度的稀有档案。海龙囤现已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播州始祖杨端史考

内容提要：杨端是统治播州(今贵州遵义)达近七百二十五

年的杨氏家族之始祖。近代以前，史载皆以杨端为山西太原汉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学者谭其骧对其民族身份提出异议，认为杨氏族属为川南之罗族（今彝族），文章发表后，又衍生出苗族、白族、仡佬族三说；杨端其人之存在，则在上世纪末禹明先撰文提出新见。杨端其人及其族别问题，事关黔北历史真伪、事关黔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对二学者之论逐一缕析，认为确有杨端其人，祖籍山西太原，汉族。

关键词：杨氏家族杨端族别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2—97—102

自唐僖宗乾符年间杨氏入播，至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平播之战结束，杨氏土司统治播州长达约七百二十五年，历经唐、五代、宋、元、明五个历史时期。史载杨端是杨氏家族始祖，且是以外来者和外族的身份入主播州。因而，是否有杨端其人？杨端的民族身份何属？是研究黔北地方历史、地方文化无法回避的两个关键问题。厘清此二题，有助于梳理黔北古代历史的线索，有助于解析黔北地方少数民族文化与它民族文化特别是汉民族文化间复杂而微妙关系的变异脉络。

一、杨端其人

杨端为播州杨氏土司之始祖，古今无异说。唯禹明先《杨端考》以为“‘杨端’其人是《杨文神道碑》中首次提出的。（中

略)杨氏杜撰‘杨端’其人是很高妙的，凡是开头均称‘端’，杨端即是‘杨氏之始祖’和‘杨氏之鼻祖’的意思，故《杨文神道碑》把‘杨端’同‘鼻祖’并称。按《杨粲墓志》和《杨文神道碑》所记情况，杨氏最先想挂靠杨思权，后恐被后人考出后见笑或责难，于是杜撰一个‘史无对证’的‘杨端’来装饰家史。〔1〕”然本文以为，其论点论证颇可商榷。

其一，杨端生活年代。禹文说：“《杨文神道碑》载：‘宋庆历间，十一世祖实讨平邕、广之侬智高。’据《宋史》‘狄青传’和‘杨业传’，狄、杨二人平侬智高是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至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若按25岁为一代人计算，自鼻祖杨端到十一世杨实，计为275年，也就是说从庆历时的十一世杨实起上推275年，正值唐代‘大历’时期，说明鼻祖杨端生活在唐朝‘大历’时，与《杨文神道碑》的：‘宣宗末年，

播州鼻祖端奉命平定南诏’事相距百余年，杨端生平不可能跨越这么长的历史时空。”禹文以此为推翻杨端存在的大证据，而其实所论有误。据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所录《杨文神道碑》载：“(前略)五季乱，天日离隔，杨氏世守此土。口平邕广之侬智高，十世祖昭，被旨讨泸，归职方。(后略)许以世守。自祖入播，以迄于君，凡十有五世。”〔2〕其中并无“宋庆历间，十一世祖实”字样，不知禹文所据何本？此点一误，则其后所计算之时间自然全不可信。且碑文中明确标出“自祖入播，以迄于君，凡十

有五世。”据《杨氏家传》，杨文之前杨氏世系为杨端、杨牧南、杨部射、杨三公、杨实、杨昭、杨贵迁、杨光震、杨文广、杨惟聪、杨选、杨轸（杨轼）、杨粲、杨价、杨文，正好十五世，杨实岂有可能为“十一世祖”？《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中所录之“十世祖昭”亦当有误，十当作六，或碑文文字漫漶所致。

其二，乾符三年高骈所领之播州 I 军。禹文自称据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与郑珍《遵义府志·土官》知“乾符三年，王仙芝和黄巢起义军攻占河南和湖北大部分地区，威胁洛阳和长安，唐统治者征调益、渝、播诸军由曾任西川节度使的高骈率领到荆襄一带组成‘诸道行营’军，阻止起义军向南发展。广明元年（公元880年），起义军在安徽采石重创唐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军队，播州军犹朝覲身歿。”〔2〕以为可证明“播州在乾符时处于安定状态，不存在南诏人陷播州事。”〔2〕今考，西川节度使高骈征调播州军组建“诸道行营”军之事不见于两《唐书·僖宗本纪》与《高骈传》。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亦仅云“广明元年，起义军重创唐诸道行营都统高骈的军队，突破唐军的长江防线”，〔4〕（P215）并未提到有播州军。而禹文所言之犹朝覲与播州军乃引自《遵义府志·土官》，然《府志》引自《心斋随笔》，《心斋随笔》又引自犹西樵之《瓮水世谱》，“广明元年，（犹朝覲）从征黄巢，阵没，赠播瓮万户。”〔5〕（P986）禹文对于杨氏之家传以为完全不可信，但对于犹氏之家谱则毫

不考究深信不疑，所得出的“研究和考证”结论自然不能令人信服。且万户一职乃金初设置，朝覲乃唐人，又岂能得到万户的封赠？

其三，杨端功成不回朝廷。禹文引《新唐书·兵志》：“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因此以为“杨端‘受招募为将’和功就不回朝廷而留居播州一事与唐朝用将制度不合。”[2] 此亦断章取义之误。考《新唐书卷五十·兵制》载：“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6] (P1328) 此乃府兵制之特色，而府兵制自唐玄宗时已废弃，“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坏(中略)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

[6] (P1326) “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6] (P1326) 禹文以唐初府兵制之特点来衡量唐末募兵制时之情形，自然矛盾重重。

其四，杨端入播后播州仍有流官。《遵义府志卷十·古迹》载明詹淑《讲堂铭序》曰：“万历甲辰秋，余修旺草公署，掘地得碑，题曰‘汉尹珍讲堂。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初立’。”[5] (P319) 广明为唐僖宗之年号，紧接乾符。故禹文以为：“唐制下州只设‘三曹参军事’官，即：司仓、司

户、司法，职级‘从八品下’。播州司户崔初立碑在乾符之后，若乾符时杨端已入主播州，那么广明时播州‘三曹参军事’官这一重要职务必由杨端嫡派充任，可随杨端入播的令狐、成、赵、友、娄、梁、韦、谢八姓中并无‘崔氏’。”〔2〕禹文此处亦可商榷。考《新唐书卷四十九·百官志》载：“下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别驾一人，从五品上；司马一人，从六品上；录事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上；录事一人，从九品下；司仓参军事、司户参军事、司田参军事、司法参军事各一人，从八品下；参军事二人，从九品下；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6〕（P318）可见司户一职实非如禹文所言之显赫，更非“必由杨端嫡派充任”者。至于此司户为朝廷所设之流官抑或杨端私人任命，今难确考，然以流官之可能性为大。《杨文神道碑》载：“忠烈及忠显尝面命之日，吾家自唐守播”，自元初程钜夫以来所有记载皆言杨端复播后受播州刺史一职，如杨端之职为朝廷所授，则乾符后即使有流官也不足异了。

其五，《舆地广记》中之播州。《舆地广记》为北宋欧阳志撰，禹文以为，“成书于政和元年三月”，“故研究杨氏家史应以《舆地广记》为信史”。“《舆地广记》载：‘唐衰，播州为杨氏两族所分据。’这与《宋史蛮夷传》：‘唐季之乱，蛮酋分据其地’的论述是吻合的，说明杨氏并非‘平南诏人播’，而是唐末分据其地的土著望族。”〔2〕禹文此处结论令人亦难认同。

《舆地广记》言唐末播州为杨氏两族所分据与《宋史》合，亦

与《杨氏家传》无异，即第四世杨先、杨蚁之事，《宋史》言播州为蛮酋所分据，亦与《家传》合，杨氏至十三世杨粲时方讨平境内诸溪洞蛮，但所不解者，禹文何以能由《輿地广记》之记载推导出“杨氏并非‘平南诏人播’，而是唐末分据其地的土著望族”？

其六，杨端名字之真伪。禹文以为：“凡是开头均称‘端’，杨端即是‘杨氏之始祖’和‘杨氏之鼻祖’的意思，故《杨文神道碑》把‘杨端’同‘鼻祖’并称。”〔2〕此点尤属荒诞。端字乃习见之字，常见于人名，且《杨文神道碑》明言“鼻祖端”，则端为人名无疑。禹文又言“‘杨端’其人是《杨文神道碑》中首次提出的。”亦嫌不当。有关杨端之确切记载，现存可考的最早资料为《杨文神道碑》，但之前有无记载，无法确证，《杨粲神道碑》中已有退南诏的记载，与杨端之事相合，只是因为杨粲碑残存者今四分之一，脱落之处是否有杨端之资料，今不可知。而禹文“提出”一词，则意为杨端之名乃杨文碑中所凭空创造，然此无任何证据，乃想当然之论。综上可知，《杨端考》中试图推翻杨端存在的观点，无法成立，故不足为据。

二、杨端的族别

近代以前，论者皆认同杨端为山西太原人，以应募击南诏而至播州。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谭其骧才提出异议，撰《遵义杨保考》，认为杨氏家族自以为山西太原人及杨家将之后皆不

可信，杨氏乃川南泸南之罗族(今彝族)，以与闽蛮争夺溪洞地盘而至播州。此说一出，震惊学界，谭氏亦自以为“可以发前人所未发，补旧史之不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杨端的族属，又有章光恺的白族说①、王兴骥的仡佬族说②及《贵州古代史》之苗族说。而此四说皆立论尚嫌未充分，似不能代替传统所据之太原汉人一说。试缕析如下。

谭其骧认为杨端非太原汉人之理由主要有五：

一、杨贵迁“为(杨)业后之说不可信，则端之为太原人，亦不足信。”〔7〕

二、《杨氏家传》载，杨贵迁欲孝汉制南粤故事，出蚌舸击广西邕州之侬智高，不南行，反北如泸，故谭氏以为“贵迁缘何如泸，今无由晓，要之其为自新郭返于故土则可知。”〔7〕

三、唐僖宗乾符三年时，播州未陷于南诏，“(萧)遘最早在(唐懿宗咸通十四年)九月以前犹官于播州，足证先时南诏之寇黔中，播州未尝复失。”〔7〕故谭文以为杨端复播不可信。

四、“同一复播，而杨氏谱以为为唐室讨南诏，罗氏以为助太 汪击闽蛮，非昏蒙无识者不难立辨其真贋矣。”〔7〕

五、杨端复播，为当时丰功伟绩，然两《唐书》皆不载，可知此非事实。

本文以为，谭文籍以推翻杨端为太原人因讨南诏而至遵义的以上五条证据似尚有可商榷之处。

一、以为杨贵迁为杨业后不足信，所以杨端为太原人亦不

可信，此种推论实在不合逻辑。对于杨贵迁为杨业之后的说法，确不可信，但不足以以此来推翻杨端为太原人之说。又，谭文以为“贵迁一生实在文广南行之前，迨至文广之‘持节’广西，贵迁已谢弃人世矣”，此点实有误，考《宋史卷十五·神宗二》载：“熙宁六年五月癸卯朔，播州杨贵迁遣子光震遵来贡，以光震为三班奉职。”〔8〕（p283）熙宁六年为公元1073年，文广持节广西当在仁宗皇{；占至英宗治平年间，即公元1067年之前，说明文广持节广西时贵迁确在人世。

二、讨侬智高之事，杨贵迁讨广西之侬智高不由南反由北。杨贵迁是否参与平侬智高之事，尚无其他史料为证，若其为真，亦不无原因。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第叁肆篇之四《播州群；1可道及群舸通桂、邕、安南道》载，由播州南渡今乌江至琰州至群州至田州至邕州，为唐代之普通道路，即汉武帝时唐蒙所谓由夜郎制南粤之道。〔9〕（p1303～1305）然北宋初播州之南乃与杨氏为敌之少数民族所据，尤其以南部闽蛮势力最大，与杨氏之矛盾亦最深，此时杨氏之实力尚远逊于闽蛮，岂敢向南行军？而播州至广西邕州尚另有一道可往，即北经珍州、南州至江津县，沿江西行经合江、泸州至戎州，戎州南至昆明为唐代西南主要干道，沿此道中途折向东至南宁州（即今曲靖）经盘州即到达群州，群州至邕州一段则相同。此道至广西较远，然可会和四川军队，顺利通达，道路质量亦较优。此亦非谭文所言不可思议者。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08135007031007007>